

## 【文学研究】

## 明末唐诗选本评判与《唐诗解》选诗标准之生成

薛宝生

(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成都 610064)

**摘要:**明末瞿人唐汝询选解唐诗,勒为一书,是为《唐诗解》。其所选受高棅《唐诗正声》及李攀龙《唐诗选》的影响,试图整合高、李二选之长,选出“于唐诗或庶几矣”之选本,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仍表现出明代“尊尚盛唐”的主流选诗倾向。然究其选诗标准的生成,则与明末唐诗选本的时代评判有着重大关系。而其诗学理论上则承袭严羽、杨士弘,近尊高棅、李攀龙,展现出一条明显的沿袭轨迹。

**关键词:**唐汝询《唐诗解》;高棅《唐诗正声》;李攀龙

**中图分类号:**I207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9-5128(2014)01-0052-06

**收稿日期:**2013-10-08

**作者简介:**薛宝生(1984—),男,甘肃平凉人,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唐宋文学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。

明代唐诗选家众多,且身份各异,加之个人的审美情趣的差异,因而所执选诗标准亦不同。唐汝询自言其选诗情形曰“选唐诗者,无虑数十种,而正法眼藏,无逾高、李。然高之《正声》,体格纂正而稍入于卑,李之《诗选》,风骨纂高而微伤于刻。余收其二美,裁其二偏,因复合选之,得若干首,令观者驾格于高而标奇于李,其于唐诗或庶几矣。”<sup>[1]2</sup>

## 一、《正声》及《唐诗选》的时代评判

自万历初李攀龙的诗选<sup>①</sup>付梓以来,明代学人多将其与高选相提并论,褒奖与批评之声并起。在唐汝询之前的屠隆、胡震亨等人就将高选与李选置于一一起加以评判。屠隆《高以达少参选唐诗序》云“昔高廷礼氏选《唐诗品汇》,备矣而太滥;约而《正声》,精矣而多遗。至李于鳞《选》,更加精焉,然取悲壮而去清远,采峭直而舍婉丽,重气骨而略性情,犹不无遗恨焉。”<sup>[2]卷三,176</sup>在这里,屠隆对《正声》与《唐诗选》做了评判:关于《正声》,一方面他认为《正声》是《品汇》的精华(也是指《正声》选裁较精),另一方面批评其“多遗”,即有佳作被漏收。对于李选,首先也肯定其选裁精严,但是却更多地指出了其不足,认为其选诗标准顾此失彼,不能周全。即重视有“悲壮”“峭直”“气骨”之美的诗作,而忽略了“清远”“婉丽”的“性情”之作。又焦竑《唐诗选序》云“我朝留心唐律者,首推高廷礼,

《品汇》固是详尽,稍嫌牿列;李于鳞崛起,更加芟削,良工苦心所不必言,而刻礲有之,恒自谓足以尽唐诗,乃知其精心妙会,自具别解,非唐诗果尽,要亦选唐诗者之心尽也。”<sup>[3]卷首</sup>焦竑此处没有提及《正声》,却指出了李选“刻礲”的特征。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三一亦云“《唐诗选》,李攀龙选,十三卷。……李于鳞一编复兴,学者尤宗之。详李《选》<sup>②</sup>与《正声》,皆由《品汇》中采出,亦云得其精华。但高选主于纯完,颇多下驷谬入;李选刻求精美,幸无贗宝误收。王弇州以为于鳞以意轻退作者有之,舍格轻进作者无是也。良为笃论。”<sup>[4]326</sup>胡氏指出了《正声》“下驷谬入”的特征,即是说高氏一

① 关于李攀龙的诗选有两个版本系统“诗删版本系统”及“唐诗选版本系统”。金生奎认为,现存“诗删系统”约有7个子版本,“唐诗选系统”约有29个子版本。且“诗删系统”的唐诗部分诗歌数目与“唐诗选系统”的入选唐诗数目并不一致。参见金生奎《明代唐诗选本研究》,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103-108页。

② 胡氏此处所谓《唐诗选》、李《选》似指《唐诗删》。其一,胡氏引王世贞语,所指当为同一版本。其二,胡氏所载《唐诗选》为十三卷,与今存《诗删》中唐诗部分卷数吻合。也就是说,胡氏似乎把时人对《唐诗删》的评价移入了《唐诗选》的评价中,观《诗删》唐诗部分与《唐诗选》,两者虽然收诗数目不同,但审美倾向一致,皆是重初、盛唐而略中、晚唐。两者收录的初、盛唐诗数目皆占全选的70%以上。(见表1)



味追求音律美而收了不该收的诗作。与屠隆“精矣而多遗”略有不同,屠氏认为《正声》本身收的就是精品,只不过收的不全,有诸多遗漏。而胡氏则认为《正声》迁就音律,收了不该收的诗,里面多有劣品。而关于李选则认同其苛严的选诗标准及作品的精美。至此,我们可以将以上诸人对《正声》《唐诗选》的评价稍加罗列,就会发现:关于《正声》,大

体有“精矣而多遗”“主于纯完,颇多下驷谬入”的评价结论;关于《唐诗选》则有“更加精焉”“重气骨”“刻求精美”的评判结论。那么,《唐诗解·凡例》所云“高之《正声》,体格纂正而稍入于卑,李之《诗选》,风骨纂高而微伤于刻。”<sup>[1]2</sup>则顺理成章,明显是在整合前人对《正声》《唐诗选》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评价。

表1 表示几种选本选录四唐诗歌比例比照图<sup>①</sup>

	初唐	盛唐	中唐	晚唐	不可考者
唐音	41.6%		38.2%	20.2%	0
唐诗品汇	14.4%	32%	34.7%	11.6%	7.3%
唐诗正声	9.5%	50.5%	33.1%	5.7%	1.2%
唐诗选	18.6%	58.7%	17.6%	3.4%	1.7%
诗删(唐诗部分)	16.9%	60.1%	16.5%	2.4%	4.1%
唐诗解	12%	54%	28%	5%	1%
诗归	15%	51.8%	21.6%	11.6%	0

除了理论上对高、李选本进行评判外,明末唐诗选家在实践上也对高、李二选选诗的标准进行了整合修正。李枻《唐诗会选》自序云“然以《品汇》之广,尚遗佳品,以《正声》之严而兼收劣制。……尝以暇日,遍阅唐诗,取诸家之选而参以鄙见,有当予心者,虽诸家之遗必取,无当予心者,虽诸家之选必删,若数语佳而全篇未称,虽工弗录。”<sup>[5]卷首</sup>李枻首先指出了《品汇》及《正声》的不足,尤其认为《正声》所选虽精严却仍有“劣制”作品混入,并以是否“当予心”(即以自己的审美眼光)为标准,对《品汇》及《正声》所选作了实践上的去取修正。其后,黄克缙、卫一凤编选《全唐风雅》,对高、李所选作了大幅的增删,并且提出了自己的选诗标准,其《刻全唐风雅序》云“故今之所选,于高去十之五而增入者十一,于李去十之一而增入者十八。大都取其文章尔雅,音韵谐畅,雄浑高古、沉郁顿挫无不兼取,而用意必归于忠厚。”<sup>[6]卷首</sup>黄、卫对高选主要做了“删去”的工作,而对李选则主要做了“增入”的工作。从其标榜“尔雅”“忠厚”可以看出,他们是以中国古代正统诗教的标准来打量唐诗,这是

其选诗的根本性原则,而“音韵谐畅、雄浑高古、沉郁顿挫”之语则是对诗歌的音乐美及风格气势的具体要求。之后,便是唐汝询在《唐诗解》中对高、李的选诗标准进行整合,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讨论。

在唐汝询之后,亦有在理论与实践上对《正声》及《唐诗选》做修正工作的,如郭浚《增定唐诗正声序》云“我明高廷礼先生尝辑《品汇》,拔其尤为《正声》,标格闲体,典则可法,飒飒乎洵一代雅音矣,而人顾取其平者摘之。济南《诗选》,风骨纂高,而人仅录其然之响,且谓伤于剋也。自钟伯敬先生《诗归》出,奇情秀句咸得评目焉,以佐高、李之不及……余与二三学人反复商榷,合梓二家之选,取其不悖于正者稍益之。收菽双美,救其二偏,俾世之为诗者,知象必意,副情必法,畅歌之而声中宫商,揽之而色薄云汉,循循然不逾矩矱,而一出于性情之正,唐调其不亡矣。”<sup>[7]卷首</sup>郭浚所谓“标格闲体,典则可法”,即是唐氏所谓“体格纂正”;而其谓“风骨纂高”,则因袭重申了唐氏及前人的说法。值得注意的是,郭氏在整合高、李选诗标准的过程

<sup>①</sup> 表1中《唐诗选》的数据是笔者据明闵氏刻朱墨套印本统计所得,该选收诗465首,其中初唐86首;盛唐273首;中唐82首;晚唐16首;时代不可考者8首。《唐诗解》的数据,请参看薛宝生《唐汝询唐诗解研究》,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0年第30-31页。其余数据均来自陈国球先生《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》,分别见于第179页、第204页、第205页、第212页、第235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


中,一方面就前人对高、李选本的普遍评判进行了反驳。他认为前人对高选的看法(如“颇多下驷谬入”“稍入于卑”等)是“顾取其平者摘之”的缘故;对李选的看法(如“伤于剋”“刻礲”等)是“仅录其然之响”的结果。另一方面,他认为高、李二选也有“不及”之处。“顾取其平者”之语,即是承认高选里确有一部分“平者”存在“其然之响”,即是传统上被认定的名篇佳作,李于鳞以数百首的数量“尽唐诗”,而将许多传统上被视为佳作的篇章遗漏。“仅录其然之响”也就是承认有“非其然之响”存在。故而郭氏才有“收荪双美,救其二偏”,编录“一出于性情之正”的选本选诗理想。

## 二、《唐诗解》选诗所参底本问题

高、李二选在明代多次刊刻,特别是嘉靖以后刊刻颇为频繁。现存的高、李二选刊本有近 50 种,其中高棅《唐诗正声》的刊本约有 13 种<sup>①</sup>,李攀龙的《诗选》,包括《诗删》系统在内约有 34 种版本。<sup>[8]103-108</sup>《唐诗解·凡例》云“凡《正声》所选,有应删者,略其注而各附于诸人之末。其无可附者,则以世次而附于一卷之末。正以是编行世既久,不欲废其全书云。”<sup>[1]2</sup>可见,《唐诗解》对《唐诗正声》是全部过录的,且《唐诗正声》各本选诗数量一致。而李攀龙《诗选》的版本情况却极其复杂,各本选诗数量也很不一致。因而,要弄清楚《唐诗解》选诗所参的底本问题,关键在于考察其所参的李选版本。

李于鳞选汉魏、南北朝、唐、明诗成《诗删》一书,未及行世,便撒手人寰。王世贞《古今诗删原序》云“李攀龙于鳞所为《古今诗删》,成。凡数年,而歿。歿而新都汪时元,谋梓之。走数千里以序属世贞。”<sup>[9]卷67</sup>李攀龙卒于隆庆四年(1570)。万历初年,汪时元刻成此书,以三十四卷十二册行于世。之后,坊贾为谋利,从《诗删》中抽出唐代部分,加以增删批点,进而付梓,单行于世,是为《唐诗选》。从此,关于李攀龙的诗选便有两个版本系统:“诗删版本系统”及“唐诗选版本系统”。据金生奎《明代唐诗选本研究》一书罗列,“诗删系统”约有 7 个子版本,“唐诗选系统”约有 29 个子版本。且“诗删系统”的唐诗入选数目与“唐诗选系统”的入选数目并不一致;就连“唐诗选系统”内部各个子版本的唐诗入选数目也不尽一致,最少的 400 多首,最多的 900 多首。而且此系统选诗数,随着后

来的笺、评者日益增多而有所增加。如最早的蒋一葵的笺释本收诗 465 首,到万历四十六年的唐诗训解本则增至 486 首,到清末光绪五年的刻本已增至 963 首。

因此,要弄清楚唐氏所参的李选底本,首先要弄清楚所参为“诗删系统”还是“诗选系统”?唐汝询编《唐诗解》时参考的究竟是哪个选本系统呢?笔者以为,唐汝询所参当为“诗选系统”的本子。原因有二:其一,《唐诗解·凡例》云“高之《正声》,体格褻正而稍入于卑,李之《诗选》,风骨褻高而微伤于刻。”<sup>[1]2</sup>此处将高氏选本与李氏选本对举,前者称其名曰《正声》,后者所指称亦必为选本之确名,而不是泛称,故此处之《诗选》即指《唐诗选》,而非《诗删》。又《唐诗解》中评解魏万《吴宫怨》一诗时称“于鳞《选》最称严竣,而此子独见录,幸哉。”<sup>[1]397</sup>以上所举皆称“选”而不称“删”。其二,将《唐诗删》《唐诗选》与《唐诗解》对比,可以发现《唐诗选》所选诗几乎尽见于《唐诗解》<sup>②</sup>,而《唐诗删》所载的许多诗并不见于《唐诗解》。兹以所选五言古诗为例,《唐诗选》中的作品及诗人尽见于《唐诗解》,而《唐诗删》则有 57 首作品、9 位诗人不见于《唐诗解》。这种去取力度与唐氏所云的“复合选之”及《四库总目》所云的“是书取高廷礼《唐诗正声》、李于鳞《唐诗选》二书,稍为订正”<sup>[10]1763</sup>相去甚远。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得出判断,唐汝询是以“唐诗选系统”作为选诗底本的。

而“诗选”系统约有 29 种版本,到底参考的是哪一个呢?要弄清这个问题,须先弄清唐汝询选本的编选时间及刊刻时间。据清吴昌祺《删订唐诗解·例言》及陈继儒《唐诗解元序》,唐汝询于万历二十四年(1596)左右便开始着手编选、评解《唐诗

① 明嘉靖以前的一个半世纪,《正声》只刊刻过 2 次,第一次刊刻是在正统七年(1442),由高棅门生彭伯暉完成;第二次刊刻是在成化十七年(1481)由黄镐主持;嘉靖以后,多次重刻。从嘉靖三年华庆玄刻本到后来托名唐汝询的《汇编唐诗十集》收录本约刊刻过 11 次。

② 《唐诗选》所有入选作家不见于《唐诗解》者仅 3 人:盖嘉运、张子容、陈祐。不见于《唐诗解》的作品仅 6 首,其中盖嘉运 2 首,张子容 3 首,陈祐 1 首。



解》,万历四十三年(1615)由许周翰捐资刊刻<sup>①</sup>。如此,则可排除万历四十三年以后的版本。这样一来,约剩5种刊本:蒋一葵笺释本,王穉登参评本,一刻斋刻蒋一葵笺释本,集贤书社刻蒋一葵笺释本,唐诗选玉本。而蒋一葵笺释本与王穉登参评本收录的作家作品完全一致,皆为465首。唐诗选玉本,全称《新刻钱太史评注李于鳞唐诗选玉》,刻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。此书七卷首一卷,与蒋本及王本七卷附录一卷的篇幅一般无二。王重民先生认为,此本之前“当更有一祖本……即唐汝询、蒋一葵注解本也”<sup>[11]461</sup>。据此,则唐诗选玉本可以排除。因而,唐仲言用蒋一葵的本子的可能性便最大了。原因一,据金生奎《明代唐诗选本研究》,在“唐诗选”系统中,蒋一葵的本子是今存最早的,最迟当刻于万历二十一年(1593)。此时唐汝询大约二十岁左右。原因二,在这5种本子中,蒋一葵的本子是最流行的,刊刻次数多,容易得到。万历四十三年以前的5种本子之中就有3种是蒋本,一刻斋与集贤书社的本子是蒋一葵笺释本的重刻本。原因三,《四库提要》在《唐诗选》一条称“《唐诗选》七卷(内府藏本)。旧本题明李攀龙编,唐汝询注,蒋一葵直解。……此乃割取其注,皆坊贾所为。疑蒋一葵之直解亦托名矣,然至今盛行乡塾间,亦可异也。”<sup>[12]1749</sup>此本即是出于伪托、割取嫁接,亦须有相当的可能性,才能使人不疑,即此本须与唐仲言有关系。

### 三、《唐诗解》选诗标准与实践

《唐诗解·凡例》云“高之《正声》,体格褻正而稍入于卑,李之《诗选》,风骨褻高而微伤于刻。余收其二美,裁其二偏,因复合选之,得若干首,令观者驾格于高而标奇于李,其于唐诗或庶几矣。”<sup>[11]2</sup>由此可知,唐汝询是在对高、李的选诗标准加以去取的基础上,建立起自己的选诗标准的。他试图汲取高氏的“体格褻正”和李氏的“风骨褻高”,而摒弃他们的“稍入于卑”和“微伤于刻”。“体格褻正”,主要指“声律纯完”<sup>②</sup>而言。乃指高选专主盛唐之诗,并以“声律纯完”为尺度来衡量其他时期的唐诗,故胡震亨云“而其大谬在选中晚唐,必绳之以盛唐格调。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,而晚未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。”<sup>[4]327</sup>而《正声》源出于《唐诗品汇》,乃是得其精华者,亦必“绳之以盛唐格调”。在此标准下,必然对中、晚唐诗淘汰过多,

甚至连初唐诗也不能幸免。胡应麟《诗薮》外编卷四以实例为证云“《正声》不取四杰……盖王、杨、近体,未脱梁、陈、卢、骆长歌,有伤大雅,律之正体,俱未当行。惟照邻、宾王二排律合作,则正声亟收之。”<sup>[12]191</sup>而对于盛唐诗歌中一些思想艺术性不高的作品,只因是盛唐之诗,因而也在收录之列,所谓“稍入于卑”。正如孙春青《论高棅的“正变”观》一文称“高棅以‘声律纯完’的‘正声’作为别裁伪体的标准,既排除了初唐的绮靡音调,也排除了中唐韩愈求怪求奇之新声……体现为圆融流转的声调之完美的盛唐之音。”<sup>[13]</sup>

“风骨褻高而微伤于刻”,“风骨”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。“风骨褻高”,即谓李于鳞选诗,执着于风骨,所选俱明朗刚健者。清李重华所云可以为证“李于鳞天分极好,但学力未至,所选唐诗数百首,俱冠冕整齐、声响宏亮者,未尽各家精髓,至所定五言古,尤蠹测管窥。”<sup>[14]937</sup>又王振汉先生《唐汝询及其唐诗解》一文称“明人评唐诗,从未孤立地对待唐诗,而总是将宋诗作为参照来评论唐诗……崇唐倾向已由尊唐抑宋发展到绝对排斥宋诗,李攀龙《唐诗选》正是这种格调派唐诗观的代表。宁肯接纳初唐合乎‘正格’的作品,而极力贬斥中晚唐‘变格’的作品,以显示唐诗的‘雅正’。”<sup>[15]</sup>唐诗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,而李于鳞所选“俱冠冕整齐、声响宏亮者”,其所执者,俨然盛唐风骨也。以盛唐风骨考量初、中、晚唐之诗,伤于苛刻,自当在所不免,此所谓“微伤于刻”。故王世贞云“于鳞以意而轻退古之作者,间有之;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,则无是也。”<sup>[9]卷67</sup>

唐汝询欲“收其二美,裁其二偏”,“二美”者,即高选“体格之正”,李选“风骨褻高”。高廷礼执着于“声律纯完”,在选诗过程中偏重盛唐之音;李

① 陈继儒《唐诗解原序》云“前太守周翰许公延见……捐俸为君刻《唐诗解》。”吴昌祺《删定唐诗解·例言》又云“此书《唐诗解》刻于万历乙卯,而《古诗解》则刻于崇祯。”万历乙卯,即万历四十三年(1615)。“苦心二十年未能授梓”,由万历乙卯上推20年,即为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唐氏约此时开始着手选解《唐诗解》。

② 高棅《唐诗正声·凡例》云“题曰《正声》者,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矣。”黄镐《唐诗正声序》亦云:“采取唐人所作,得声律纯正者……名曰《唐诗正声》。”



于鳞执着于风骨,欲以数百首尽唐诗,所选“俱冠冕整齐、声响宏亮”者。因而,此二美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盛唐之诗。唐汝询在选诗中确实收拢了高、李之“二美”,其《唐诗解》共选诗 1546 首(包括误收宋人诗 2 首),所选盛唐诗 833 首,数量居四唐诗歌之首,在诗选中所占比重为 54%,即是明证(见表 1)。而所谓“二偏”者,即高选之“稍入于卑”,李选之“微伤于刻”。究此“二偏”产生的原因,乃是执着于盛唐风骨,以盛唐的标准打量全唐诗歌之故。裁此二偏,即是要以更为广阔的品评眼光打量四唐之诗,而不局限于盛唐,但这种主张在唐氏的《唐诗解》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口号,并没有落到实处。虽较李选有所转变,但仍只是四唐诗篇去取数量上的轻微调整,与《正声》《唐诗选》去取差别并不大,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以盛唐标准考量四唐诗的艺术眼光。

唐汝询“尚盛唐”的选诗眼光,显然是受高、李的直接影响,而在选诗传统上则远承《唐音》。元代杨士弘将“尚盛唐”的倾向引入《唐音》的编选中,其云“中唐以来,作者渐盛,然音律亦渐微,选其近盛唐者,通得十七人,共诗五十八首。”<sup>[16]</sup>七律卷中又云“自大历已降,虽有卓然成家,或沦于怪,或迫于险,或近于庸俗,或穷于寒苦,或流于靡丽,或过于刻削,皆不及录。”<sup>[16]</sup>正音卷首选中唐诗,却以“近盛唐”为标准,同时,对大历以还的诗作多所贬黜,其崇尚盛唐,以盛唐为准式之诗学观,于此可见一斑。明初,高棅论诗,规模严羽,杨士弘又近取林鸿而崇尚盛唐<sup>①</sup>,其在《唐诗正声》的选录中,初、盛唐诗占 60%,单盛唐诗就占了 50.5%,进一步实践了其“尚盛唐”诗论主张。李攀龙受高棅影响,论诗颇重盛唐而鄙薄中、晚唐<sup>②</sup>,其《古今诗删》所选唐诗部分中,初、盛唐诗占 77%,单盛唐诗就占了 60.1%,可以说对盛唐诗的推崇几乎无以复加。而经书贾割裂的《唐诗选》,其收诗亦以盛唐为宗,初、盛唐诗占 77.3%,单盛唐诗就占了 58.7%。唐汝询紧承其后,颇能继承这一选诗传统,其《唐诗解》中,所选初、盛唐诗占 66%,单盛唐诗就占了 54%。同时,其在解诗过程中也表现出一种重风骨、兴味,反对纤弱、雕琢的诗学取向,这与盛唐诗的典型特征相吻合,如下例:

允言语素思弱,独此绝《和张仆射塞下曲》  
雄健,堪入盛唐乐府。<sup>[1]</sup><sup>546</sup>

沧浪谓载之之诗有盛唐风骨,读之信

然。<sup>[1]</sup><sup>755</sup>

延清(宋之问)可谓鸡群之鹤。然“今朝”  
“昨夜”终有斧凿痕。<sup>[1]</sup><sup>615</sup>

此(杜甫《野望》)赋野望之景以成篇,无  
他托意而兴味自佳。<sup>[1]</sup><sup>907</sup>

孟之兴味绝类渊明,独恨以律易古  
耳。<sup>[1]</sup><sup>933</sup>

引文中唐汝询标榜“兴味”称赏“雄健”的“盛唐风骨”,反对“语素思弱”,其所追求的正是开元、天宝诸公之诗中表现出的明朗刚健的气象,与复古派所标举者毫无二致。

#### 四、结语

以上数据及实例表明:从元杨士弘到明末唐汝询之间,在选诗标准方面,确有一条明显的沿袭路径。即便是着力标榜“别出之调”而稍后于《唐诗解》的《唐诗归》,所选也还是尊尚盛唐,其选盛唐诗约占全选的 51.8%。唐汝询《唐诗解》于万历四十三年(1615)付梓以前,先因“其兄汝谔,笃嗜王、李之学,故汝询所作,亦演七子流派”<sup>[10]</sup><sup>2507</sup>。之后,袁中郎勇革王李之弊,公安后学矫枉过正而师心率性,以致“雅故灭裂,风华扫地”<sup>[17]</sup><sup>567</sup>。唐氏都一一亲历,故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,其《唐诗解》中的论诗思想还呈现出与时新变的一面。表现出主新变,反对蹈袭;尚含蓄,反对粗俗的特征,但在选诗上却仍未能跳出高、李等人明体辨格、尊尚盛唐的藩篱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[明]唐汝询.《唐诗解》[M].王振汉,点校,保定:河北大学出版社,2001.
- [2] [明]屠隆.《白榆集》[M].台北: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,1977.
- [3] [明]李攀龙,王穉登.《唐诗选》[M].评定.明闵氏刻朱墨套印本.

<sup>①</sup> 其云“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‘上自苏李……唯李唐作者,可谓大成;然贞观尚习孤陋,神龙渐变常调;开元天宝间,神秀声律,粲然大备,故学者当以是楷式’予以为确论。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,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辩,益以林之言可征。”参见高棅《唐诗品汇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。

<sup>②</sup> 《明史·李攀龙传》云“攀龙遂为之魁,其持论谓文自西京,诗自天宝而下,俱无足观。”张廷玉等《明史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版第 7378 页。



- [4] [明]胡震亨.唐音癸签[M].周本淳 校订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
- [5] [明]李栻.唐诗会选[M].明万历甲戌(1574)刻本.
- [6] [明]黄克缙,卫一凤.全唐风雅[M].明万历四十六年(1618)年刻本.
- [7] [明]郭浚.增定唐诗正声[M].明天启六年刻本.
- [8] 金生奎.明代唐诗选本研究[M].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9] [明]王世贞.弇州四部稿[M].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:第1280册.台湾商务印书馆,1965.
- [10] [清]永瑢.四库全书总目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11] 王重民.中国善本书提要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.
- [12] [明]胡应麟.诗薮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- [13] 孙春青.论高棅的“正变”观[J].内蒙古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5(2):68-73.
- [14] [清]李重华.贞一斋诗话[M].清诗话本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
- [15] 王振汉,范海玉.唐汝洵及其《唐诗解》[J].河北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9(4):13-17.
- [16] [元]杨士弘.唐音[M].元至正四年(1344)刊本.
- [17] [清]钱谦益.列朝诗集小传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.

【责任编辑 朱正平】

##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udgments and the Standard of Extraction on Notes on Poems in Tang Dynas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

XUE Bao-sheng

(Institute of Chinese Popular Culture, Sichuan University, Chengdu 610064, China)

**Abstract:**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, Tang Ru-xun finished *Notes on Poems in Tang Dynasty*. He planned to produce a better book that contains the essence of Tang poetry by integrating the advantages from *Tang Poetry Zheng Sheng* and *Collection of Poems in Tang Dynasty*. However, the book showed an inclination to praise the prime-Tang poems highly. However, the standard of his extr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judgmen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. And his poetic theory showed a distinct trace of inheritance, which was influenced greatly by Yan Yu, Yang Shi-hong, Gao Bing and Li Pan-long.

**Key words:** Tang Ru-xun; *Notes on Poems in Tang Dynasty*; Gao Bing; *Tang Poetry Zheng Sheng*; Li Pan-long

### 渭南师范学院成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

近日,渭南师范学院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成立。研究院聘请史学家张岂之先生、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、杨燕起先生为顾问,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教授担任名誉院长,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、渭南师范学院院长、《渭南师范学院学报》主编丁德科教授任名誉院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,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张新科教授、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丁波总编辑等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。王亚玲教授任研究院院长,凌朝栋教授任常务副院长,王炳社教授、王双喜教授、曹强博士、梁燕玲教授、袁梁博士任研究院副院长。

我校作为司马迁故里的高等学府,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是我校的科研特色。研究院以陕西(高校)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—秦东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依托,将跨学科、多维度研究司马迁与《史记》。研究院下设司马迁与《史记》史学研究室、司马迁与《史记》文学研究室、司马迁与《史记》政治思想研究室、司马迁与《史记》语言民俗研究室、《史记》文献研究室、司马迁与《史记》社会思想研究室、司马迁与《史记》农业经济研究室等分支机构。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力争三年内出版《〈史记〉通解》《中国〈史记〉研究集成》《〈史记〉精粹》(英译本)等系列性、标志性和高水平论著,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打造为研究平台、交流平台和服务平台。

近年来,我校史记研究团队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50余项;在《文学遗产》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,多篇论文被《新华文摘》《高校文科学报文摘》、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、转摘;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;编辑出版《司马迁与〈史记〉研究年鉴》8卷;获得省高校优秀人文社科成果奖12项,校级奖励30多项。2013年,由丁德科、凌朝栋担任主编,组织校内研究团队与商务印书馆合作,校勘整理了“《史记》选本丛书”系列著作,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。《渭南师范学院学报》“司马迁与《史记》研究”栏目自1989年正式设立,至今已25年102期从未间断,成为《渭南师范学院学报》的标志性栏目。

(曹强)

